

第八章 ||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面推向 21 世纪

1992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迈出新的步伐，国内外十分关注。在指导起草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过程中，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为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作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这实际上是一次就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寻求共识的“吹风会”。在讲话中，江泽民列举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几种提法，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会后，江泽民就此征求了邓小平等同志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并说：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江泽民的这篇讲话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一、党的十四大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四大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大会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作出调整，把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至9%；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要求，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

二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三是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大会报告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 党的十四大会场

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章修正案写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从严治党,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增写了纪律的重要性,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大会选举产生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

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全国上下积极性高涨，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的目光也聚焦中国，来华投资热再度兴起。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纲领的制定和实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修修补补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能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人们对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四个字，还存在不同认识。对此，江泽民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

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这就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与国情相结合，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完全一样，不能照搬照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我国的显著特征，必须处理好发挥市场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十多年艰辛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按照党的十四大的决策，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同时抓紧制定总体规划，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其基本框架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整体性推进。

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务院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加快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

改革带来了供给能力的提升和物质的丰富。1992年之

后，我国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不仅是粮食，交由市场定价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的生活资料。一度遇到挫折的价格改革，波澜不惊地取得了成功。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实行了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宣告终结，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进入历史博物馆。

国有企业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也是难点所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从1994年底开始，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随后，全国各地先后选定2700多家国有企业参与试点。国务院还选择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采取多种政策，在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

上述改革和调整，从实际步骤上加快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明显增强，全国呈现出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景象。

二、加强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 实现“软着陆”

经济发展实现“软着陆”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

高速度，加上原有的宏观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调控机制尚未健全，导致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猛、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物价上涨等新的问题。党中央比较快地发现了这种苗头，1992年上半年就一再提醒要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强调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只在扩大投资规模上做文章，以防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1993年4月，中央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集中讨论解决乱集资、乱拆借、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等问题。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决定采取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的16条措施，主要是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稳定外汇市场价格等。据此，国务院相继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加大金融、财税领域的整顿力度。

这次宏观调控，除了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外，主要着眼于运用经济、法律手段，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把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经过3年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投资过热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秩序逐渐好转，信贷规模总量得到控制，物价逐渐放开且涨幅明显回落。这次宏观调控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保持了经济增长的较快速度，实现了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为经济健康发展和后来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打下了基础。

“八五”计划的完成

在加强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过程中，“八五”计划提出的主要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八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3%，1995年达到61130亿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五年实现。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我国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九五”时期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作出新部署：到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议》确定到2010年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议》强调，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江泽民在全会闭幕时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12个重大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确处理改

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他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长期稳定。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三、党的十五大和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党的十五大

1997年2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全世界在关注，中国共产党能否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

大会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大会强调，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阐明了



★ 党的十五大会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大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新阐述。大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论述，体现了党在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理论认识的深化。

大会在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对如何实现第三步目标作出进一步规划，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下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围绕这个发展战略，对我国跨世纪发展作出战略部署。

大会强调，要按照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是党经过近 20 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表明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前进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了深刻阐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党的十五大以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加快推进改革，并强调着重抓好两个大头：一是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二是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对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1995年3月，江泽民在江西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重申和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农业改革和发展“两个飞跃”^①的思想，指出要长期保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不变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从长远趋势来说，逐步走上集约化、集体化道路，是农村发展的大方向。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的加快，我国农业管理体制和产业结构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对农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方针。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

^①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全会提出的坚定不移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的政策，让亿万农民安心地在承包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和经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为解决贫困地区农民温饱和增收问题，党和政府采取多方面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扶贫工作。1994 年制定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力争用 7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 8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计划实施过程中，中央扶贫资金累计投入 1127 亿元。到 2000 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到 3209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 3.5% 左右。全国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大部分行政村实现了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贫困状况得到缓解。

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目标要求，1994 年底开始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由于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沉重等原因，再加上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寻求新思路，才能取得新突破。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即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党的十五大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全面展开。国务院按照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

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改革思路，以纺织行业为突破口，通过债转股、国家技改专项资金、国企上市变现、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打响三年脱困攻坚战。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上海宝钢集团等一批按照市场要求运作的特大型企业集团相继组建，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出重要一步。这些大型国企按照市场要求运作，不再承担行政性职能，增强了自我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国有小企业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改革步伐。到2000年末，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增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大量职工下岗问题，党中央反复强调，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几十年来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要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满腔热忱和极端负责地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1996年，上海率先创建再就业服务中心，大力推进再就业工程。这项“民心工程”推向全国后，为国企职工分流架起了从企业到市场的桥梁。1998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各级政府按照中央部署，为下岗职工建立起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启动以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许多地方还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引导职工转变择业观念，积极

发展第三产业，拓宽就业渠道。这些措施保障了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和风险。

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对内深化改革与对外扩大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20世纪90年代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党中央敏锐观察和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毫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动对外开放迈出重大步伐。

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推进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等战略措施。随着原来在经济特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在内地逐步推行，特区的一些干部中出现了特区已经不“特”、特区还要不要“特”、还要不要继续发展的议论。1994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1998年2月，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深刻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提出我们既要敢于又要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既要充分利用其中可以利

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来发展自己，又要清醒认识和及时防范其中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和风险，稳步推进对外开放，趋利避害、掌握主动。此后，党中央又进一步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我国的发展有利也有弊，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防范工作，切实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

根据这些重大决策，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下，我国扩大开放沿海城市和内陆边境城市、沿江城市和省会城市，建立起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同时明确了以上海浦东新区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确定要在 21 世纪初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到 1997 年，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逐步形成。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中国政府于 1986 年 7 月申请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并开始同缔约各方进行谈判。1995 年 1 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中国开始与世贸组织成员国逐一进行拉锯式的双边谈判，其过程跌宕起伏，中美之间的谈判尤为复杂艰难。从“复关”到“入世”，中国进行了长达 15 年的谈判。其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做了大量工作。2001 年 11 月 10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 143 名成员。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

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地迈向世界市场。实践证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参与制定规则和竞争的有利位置，从而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天地，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

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还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在科学技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1995年5月，党中央准确分析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就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不断提高创新能力。5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



★ 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

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后，在继续实施“863”计划的同时，1997年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加强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工作。党中央还敏锐地认识到，信息化是一场带有深刻变革意义的科技创新，强调要积极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1999年11月，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神舟一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在载人航天飞行技术上获得了重大突破。1999年“神威”计算机的问世，打破了西方国家在高性能计算机技术方面对我国的封锁。

为鼓励广大科技人员建功立业，在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

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00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于2001年2月19日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荣膺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在教育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2月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强调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99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正式实施，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同年，国家正式启动“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985工程”，重点支持若干所高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国家合理调整高校布局结构，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逐步改变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状况，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方面，逐步形成政府为主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办学新体制。国家大幅度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有力支持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我国经济高速粗放增长、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形势下，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我国发表《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党的十五大和 1998 年 3 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任务，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重大进展。199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大力推进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工业污染源达标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按功能区达标工作，全面开展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党的十五大以后，国务院颁布《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并作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严厉打击非法捕杀和经营野生动物等一系列规定，开展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启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工程，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逐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

1978 年，党中央作出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战略决策，启动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经过不懈努力，到 2001 年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建设任务，“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10%，初步建立起阻止风沙南侵的绿色长城。这项工程被誉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在建设过程中，涌现了塞罕坝林场、右玉县等一批防沙造林、改善生态的先进典型。

西部大开发战略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和条件差异较大，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西部地区积累了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但同东部地区相比，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薄弱，经济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发展明显滞后。

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关系我国跨世纪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又强调，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1995年12月中下旬，江泽民在陕西、甘肃考察期间，开始思考和酝酿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问题。他提出，要通过国家的大力扶助，通过其他地区特别是比较发达地区的多方支援，努力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当时，西部地区面临的最突出最紧迫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1997年8月，江泽民在《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作出批示，提出要齐心协力大抓

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随后，国务院采取了在西部地区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和移民开发等一系列措施。广大西部地区的人民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规模植树造林，向荒漠化开战。

世纪之交，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加速推进，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国家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要求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对此作了进一步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面启动。随后，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确西部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国务院批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实际工作中比照西部开发的有关政策措施予以照顾。为支持西部大开发，国务院制定出台有关财税、金融、外资外贸、吸引人才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扩大西部地区公共投资规模；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有力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总揽全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推动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扩展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大胆“走出去”，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才能把技术、设备、产品和服务带出去，使我国更有条件引进新的技术、发展新的产业，并逐步形成自己的跨国公司，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

1996年7月，江泽民在河北唐山考察工作时提出，要加紧研究国有企业如何有重点有组织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这篇大文章。1997年12月，江泽民在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进一步明确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

根据这一战略部署，我国的对外开放从过去侧重引进为主，发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到非洲、中亚、中东、东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业务持续

稳定增长。到 2001 年底，我国累计参与境外资源合作项目 195 个，总投资 46 亿美元；累计设立各种境外企业 6610 家，其中中方投资 84 亿美元；境外项目平均投资达 252 万美元，比上年提高近 30%。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在实施海外投资战略中发挥了龙头作用，已初具跨国公司雏形。

“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我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拓展了我国经济发展空间。这是党中央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道路上作出的又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

五、政治文明、先进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

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建设扎实推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党的十四大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原

则，对行政管理体制、党政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党的十五大以后，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改革围绕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强化执法监管部门等方面展开。此后，又围绕转变政府职能，采取了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招投标制度等一系列深化行政改革的措施。

党的十四大以后，国家的法制建设进入“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此后，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当年1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6年2月，江泽民在党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发表讲话，把此前“以法治国”的提法改为“依法治国”，指出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的目标由“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法制”到“法治”，虽一字之别，却包含着不同的实质意义。“法制”只是法治的内容与形式之一，而“法治”则是治国理政的方式与方略。这样，依法治国就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正式确立下来。为贯彻这一基本方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把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作为首要任务，制定立法法，修改婚姻法等，颁布实施证券法、合同法等一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适应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及时修改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多个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党的十五大后，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逐步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壮大，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不断发展，城乡基层民主建设逐步加强。

加强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八九月间，江泽民在新疆考察工作时，提出各族人民要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要求，继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993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并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作出了中央各部门和15个省市对口援藏的重大决策，开创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新局面。在党中央的领导关心、全国支援下，西藏广大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推动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加强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民族教育投入，实施兴边富民行

动，开展沿海省市对口帮扶，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力度，有力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

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稳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取得新的进展和成就。

为进一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从1991年开始，中央宣传部组织实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活动^①，鼓励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出优秀作品，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精神文明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并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

^① “五个一”是指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影片、一部优秀电视剧（片）、一篇或几篇有创见有说服力的文章。从1995年度起，又将一首好歌和一部好广播剧列入评选范围，“五个一工程”的名称不变。

文明建设作出部署。全会后，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国蓬勃开展。青年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等活动，进一步得到各界的积极响应，在全社会弘扬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和扶危济困的美德。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深入广大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给农村群众带来了精神文化的享受，也使他们获得了致富的信息和技术、健康知识以及医疗服务。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新命题。十五大强调，就其主要内容来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五大以后，国家实施了文化建设“精品战略”，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文化项目建设。一批反映时代精神、贴近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健康文明的社会氛围逐渐浓厚，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不断巩固。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这一时期，党中央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摆上重要位置，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2001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9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通过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深化和拓展，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不断提高。

“九五”计划的完成和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

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 21 世纪的进程中，党团结带领人民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成功应对各种严峻风险挑战，取得了重大成就。

1997 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呈下降趋势，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面对金融危机冲击，党中央明确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改善人民生活；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打击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从多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这些对策措施很快见效。1997 年以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外贸出口也从 1999 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回升。在许多国家出现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危急情况下，中国兑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关键作用，充分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作出了贡献。

1998 年夏，我国遭遇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 2.3 亿。危急时刻，党中央高度关注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果断决策、周密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抗洪一线指挥；30 余万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参加抗洪斗争，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冲不垮的坚强大堤；灾区人民舍小家保大家、舍小局顾大局，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第一线军民，夺取了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在同洪水的搏斗中，党和人民铸就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改革开放中，在外部敌对势力渗透、颠覆活动影响下，国内一些错误倾向和不良现象时有泛起。1999 年 4 月，针对极少数人利用“法轮功”蛊惑人心、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党中央领导人民坚决果断地进行了反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重大政治斗争，及时依法取缔了这个邪教组织，发动社会各界揭批“法轮功”邪教歪理邪说，对被裹胁蒙蔽的人员进行教育转化，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一系列重大斗争的胜利，充分显示出党中央驾驭全局、应对挑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和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加充满信心。

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成就。到 2000 年，“九五”计划的主要任务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内生产总值达 99776 亿元，年均增长 8.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在 1997

年提前3年完成；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胜利实现大江截流；西煤东运新铁路通道、千万吨级钢铁基地等一批跨世纪特大型工程的兴建取得重大进展；西气东输管道工程、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扩能改造工程等先后启动。

到2000年，我国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为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

六、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20世纪90年代，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打得赢、不变质，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作出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和



★ 1999 年 10 月 1 日，江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庆典上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部署，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1991 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向世界展示了全新的作战图景，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从军事技术和战争样式来说，这是机械化战争迈向信息化战争的转折点，引发了世界性军事变革浪潮。中央军委对此高度关注，江泽民三次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座谈会，提出要看清国际形势的变化，研究将来的战争究竟怎样打，要下大气力发展国防科技，在武器装备上要有“杀手锏”。1993 年 1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上实行重大调整，明确了新形势下全军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和任务，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赋予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以新的内容。1995 年 12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

议通过《“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为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200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我军建设要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任务，以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1992年下半年至1994年底，全军体制编制进行了初步调整精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宣布，中国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通过这次调整精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为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队后勤保障体制、军事院校体系、现役士兵服役制度特别是士官制度等，也作出了重大调整和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增加了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认真贯彻科技强军、质量强军方针，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微电子、信息、传感、通信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包括潜射导弹、机动战略导弹研制等在内的一批尖端武器的突破，为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新的重要技术基础。

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把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这一时期，党中

央、中央军委修订、制定和贯彻落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始终保持人民军队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为我军完成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强保证。

七、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两岸交流扩大

香港澳门胜利回归祖国

香港进入回归祖国过渡期后，中英两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前期合作基本顺利。1989年后特别是苏东剧变后，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形势，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阻挠和对抗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对此，我们党和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1992年底，党中央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此后，中国政府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紧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和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工作。1996年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12月16日，中央政府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至此，香港回归祖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 1997年7月1日，香港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灯火通明，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交接仪式在这里举行。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下，象征着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胜利回到祖国的怀抱，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这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

在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澳门回归的步伐也在加快。1999年5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



★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

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何厚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5 月 20 日，中央政府任命何厚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1999 年 12 月 19 日午夜至 20 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交接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著名诗人闻一多 1925 年创作的《七子之歌》抒发和表达的澳门同胞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强烈期盼，在这一刻成为现实。澳门的胜利回归，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道路上树立的又一座丰碑。

回归祖国后，香港、澳门作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澳门实行管治，与之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体制得以确立。香港、澳门同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沉着应对，各界人士携手努力，妥善处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保持了香港、澳门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事实充分表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两岸交流的扩大

随着祖国大陆的发展，经过两岸同胞的多年努力，1987年10月，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探亲。11月，第一批探亲台湾同胞经香港赴大陆。至此，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逐步展开。

在此基础上，党中央稳步推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1992年3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开始进行事务性商谈。11月，双方就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1993年4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成功举行会谈，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建立了两岸制度化联系与协商机制，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将保护台商投资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促进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其他方面交流的扩大。

但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上台后，在美国等外部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逐步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台独”活动趋于猖獗。党中央科学分析台湾局势，认为既要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打击其嚣张气焰，又要深入研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1995年1月30日，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讲话既体现中国政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台湾同胞的愿望和台湾的实际情况，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

然而，李登辉在搞“台独”、搞分裂的路上愈走愈远。1995年6月，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美，公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1999年7月，他又抛出所谓“两国论”。2000年3月，台湾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上台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

针对台湾岛内和外国敌对势力不断加剧的“台独”分裂活动，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从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方面开展斗争。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震动了世界，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有力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和外国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

八、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 对外关系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格局和形势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党中央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积极应对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及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和挑战，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这一时期，我国向国际社会提出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及欧盟等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倡导并致力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展现了中国为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国际关系走向民主化的诚意、智慧和力量。

苏联解体后，中国同俄罗斯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双方经过谈判，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国间绝大部分地段的边界问题。1996年4月，中俄宣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呈现出曲折发展的复杂局面。由于美国对中国一直采取所谓接触加遏制、以遏制为主的政策，两国关系经历了几次大的波折。1999年

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年4月1日，美国战机在中国南海空域挑衅，发生了撞机事件。面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暴行和在双边关系中挑起的种种事端，中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周边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时期，我国在发展睦邻合作友好关系上取得了重要进展。1997年至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发表，中国倡导并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脑在上海举行会晤，正式形成“上海五国”机制。在此基础上，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



★ 2001年10月21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合影

区域性合作组织，它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各成员国在安全、经济和人文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防范“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打击并遏制了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维护了地区的总体稳定，促进了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实施稳定周边战略的同时，中国加强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快速深入发展，同南美地区除巴拉圭外的所有国家建交。

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加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2000年9月7日，在中国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举行联合国历史上的首次会晤。2001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博鳌成立。这是首个永久定址中国、非官方的国际性会议组织，它以平等、互惠、合作、共赢为主旨，成为亚洲和关心亚洲的各界人士加强了解、增进友谊和扩大合作的纽带。10月，我国在上海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世纪之交，我国建立起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斗争中越来越主动，国际战略空间不断扩展，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

九、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明确党的建设总目标与两大历史性课题

20 世纪 90 年代，党中央科学分析自身建设面临的新形势，积极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和途径，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1994 年 9 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党的十五大把这个总目标进一步表述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根据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2000 年 1 月，江泽民在十五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他完整提出“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认真研究和解决，使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朝气蓬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胜利前进。

党的建设总目标和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提出，升华了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适应了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三讲”教育的开展

按照党的建设总目标要求，围绕两大历史性课题，在跨世纪发展征途中，党中央紧密结合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扎实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这一时期，党中央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不断创新和改进；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及人民团体等方面的作用；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逐步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制度；高度重视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加快各级领导层的新老交替步伐；制定实施机关、高校、国企、农村、社团、非公等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意见，指导和推动各个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些措施，使党的自身建设得到了明显加强，保证了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为适应新情况，党中央及时提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要求，加

快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组建党组织，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从 2001 年 8 月起，开始在新的社会阶层中进行发展党员的试点工作。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所在。1995 年 11 月，江泽民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提出，必须把教育干部特别是教育领导干部摆在突出位置，作为关键的一环来抓，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者是紧密相连、相互统一的，核心是讲政治，讲政治必须坚持学习、必须体现在讲正气的上。1998 年 11 月至 2000 年底，全党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三讲”教育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性的实践，是延安整风精神和党的“三大作风”在历史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广大干部在“三讲”教育中切实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查找领导工作中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经受了一次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锻炼。

改革开放新阶段，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涌现出以孔繁森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孔繁森两次进藏工作，历时十载，呕心沥血，忘我工作，艰苦奋斗，政绩卓著，不幸于 1994 年因公殉职，被誉为“领导干部的楷模”。这些优秀共产党员充分展示了当代共产党人的风采，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先锋。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下，党中央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1993年8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做好反腐败工作：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二是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三是紧紧抓住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突出问题，刹住群众最不满意的几股不正之风。此后，党中央、国务院着重抓了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狠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三个方面的工作，逐步形成了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

为了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健全相关机构。1993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199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成立。这一时期，党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等党内法规。同时，规定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需申报，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的礼品需登记，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需向职代会报告等。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初步建立，逐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了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对加强作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党中央还果断作出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脱钩，实行收支两条线、工程招标、政府采购制度等决策，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对一批大案要案的查处，产生了较大震慑作用，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依然屡禁不止，有的情况甚至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软弱涣散、治党不严的问题，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管理、监督，在纪律和制度贯彻执行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实践表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深入思考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逐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明确提出“三个代表”要求。他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

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5月1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时进一步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反映

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并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它的提出，为党的十六大的召开，为全党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 21 世纪完成自己承担的神圣历史使命，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